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ShangGu TianXue ZhiShi Ji WenXian YanJiu

# 上古天学知识及文献研究

林甸甸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本书为林甸甸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天地知识与商周文献关系研究”（15CZW013），过常宝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11&ZD103）阶段性成果

ShangGu TianXue ZhiShi Ji WenXian YanJiu

# 上古天学知识及文献研究

林甸甸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天学知识及文献研究 / 林甸甸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7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5987-1

I. ①上… II. ①林… III. ①天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P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5940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30 mm×980 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20千字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9.00元

---

策划编辑: 刘松弢

责任编辑: 刘松弢 焦鹏航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天泽润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4年3月

## 序

在泾渭分明的学科框架下，除了《诗经》和《楚辞》外，其他先秦文献的文学研究，空间很有限，大多是修辞术和文章学的描述。当然，先秦邈远，文本和语言多孤立呈现，流传过程复杂，文献和文本的考证、辨析工作很多，看起来还可以一直做下去。而且，新近整理出来的简帛文献，也能给学者以一定的新鲜的刺激。但先秦文学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会给人一种沉闷的感觉。

近十余年来，我开始关注先秦时期各种经典的话语方式。这个题目文学性不强，由于涉及文本形态，所以就用“文体”的名义来申请项目、发表论著。此前文学史惯用的散文、史传散文、诸子散文、语录体、论辩体、论述体等概念，对先秦文献研究的意义其实并不大。在这个文献“自然生长”的时代，文章的形态从属于某个特定的文化行为，文献之间的影响关系微弱，很难形成文体意识。我的文献研究，实际上是对某一特定文本的生成及其形态和功能的探究，而文体就是指特定文化行为中的特定文本形态及其意义。先秦文献中，甲骨卜辞、彝器铭文，以及《诗》《书》《易》《春秋》《左传》《老子》等，这些文本产生于不同的宗教礼仪活动或职事行为，都是原初性的文本，文体也各有特点。而《论语》《墨子》等诸子文献，也各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及表述方式。可以说，在整个先秦时期，文体实



际上就是特定人群的话语方式，它从禁忌预言、训诫、传释到说理的发展过程，显示了由宗教、礼乐、道德、实用主义这样一个由神圣到世俗的文化流变过程，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功能。

这种文献研究，最为关键的是对文本作者、职事方式和文献行为的研究。祝宗巫史是殷商和西周文化的主体，他们所主导的宗教仪式或礼乐教化，直接导致了文献的产生。因此，对巫史阶层的社会地位、职事方式、话语形态和文化功能的梳理，可以构建一个渊源有自的原史传统，而文献则是这一文化传统的表征之一。从原史传统出发，考察文献形成的机制和方式，就成为理解上古文献生成和形态的关键。春秋时期，巫史地位衰落，一些贤明的贵族大夫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学习巫史文献，并通过征引这些文献作为依据，发表新的思想观点，开启了一个“立言以不朽”的时代，文献活动也空前繁荣。前代的职事文献也在这一时期被“经典化”，成为意识形态建构的资源，并为新的立言者提供话语权力。春秋“君子”和战国“诸子”，凭着从传统中获取的话语权和资源，掀起了文献生产的又一个高潮，个人作者开始出现，文献自身的传统亦开始形成。

以上工作，形成了一个“职事制度—话语权力—文献形式”的研究模式，在中国传统话语方式的形成、文献的文化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特的研究领域；当然，这其中少不了文本文献现象考索、表述方式和文献形态研究等内容。我和我的博士生们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也做出了不少成果。

对巫史职事的考察，会自然延伸到礼乐制度这个更为宏观的文化背景上。巫史职事是经典文献和礼乐制度的中介。我尝试从周公“制礼作乐”出发，探讨先秦礼乐文化的构建过程及文献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揭示礼乐文化与经典文献之间的关联。周初制礼作乐的主要手段是神道教化，出于教化的需要，各类仪式中的“辞”得到空前的重视，“辞”的形态也取决于不同的仪式。这些“辞”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类文献，《书》《诗》《易》和钟鼎铭文等，都是某种“辞”。西周近三百年的制礼作乐，礼仪和文献共生共长、缺一不可，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话语权力和文化建构能力则从礼仪逐渐向文献让渡。

职事也好，礼乐也好，都是基于某种制度的文献研究，任何制度背后都有特定的知识和观念的支持。先秦时期，各类知识和观念呈阶段性增长，对文献的生成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与之相应，文献的生成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识的增殖，两者有着依赖关系。所以，从一个特定的认知范畴来考察文献现象，对我们深入了解先秦文化很有助益。林甸甸选择“天学”这一论题作博士论文，期望通过梳理先秦时期“天学”知识的状况、相关意识形态的形成、对社会制度的影响等问题，来讨论先秦文献，尤其是月令类文献的生成、流变及其功能。这一论题，将“制度—话语—文献”研究模式，发展为“知识观念—制度—文献”模式，它所构建的上古文化模型将有更多的层次，也更为精致，这是非常值得尝试的。

“天学”知识是中国文化最为基本、原初的构成要素。我们的祖先们在仰望神秘莫测的星空时，确信那里有人类生存的理由、目的和法则，所以人们对“天”的认知，可谓孜孜以求，至今不衰。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天地两仪、五方格局、四时运转、阴阳晦朔、日食流星……无不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而对相关现象的理解所形成的“天学知识和观念”，则成为人间秩序和制度的“底版”。政治制度、社会规范、人间伦理等等，都必须有来自“天学”知识的依据。越是早期，“天学”知识在文化构建中越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巫史阶层沟通天人，是最为权威的“天学”专家，“天学”知识也赋予了他们社会执法者的权利；士大夫在继承了巫史话语权力的同时，也继承了相关的“天学”知识，并且赋予它新的内涵。可以说，先秦的意识形态，以及《诗》《书》《礼》《易》《春秋》等文献，无不在“天学”知识的笼罩之下。尤其是月令类文献，能具体地体现“天学”知识、观念在上古时代的生长、流变及实践的状况。将这些复杂的现象立体地、历时性地描述出来，有利于我们对早期文化建构过程的理解，也拓展了先秦文化和文献研究领域，是一个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课题。

对于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来说，上古“天学”这个题目有一定的难度。但在这本书中，各时期天象历法知识的梳理，神话传说中的天文知识和人文观念，各种依据“天学”知识建立的社会制度和风俗，相关文献的解读和考证，等等，都处理得很清晰，整体思路也颇得体。由于有一个独特的出发



点和视角，作者给不少习以为常的说法以更加合理的解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部博士论文受到了审阅和答辩专家的很高评价和很多鼓励。当然，这毕竟只是一个青年学者最初的学术尝试，其中一定有不少生涩、疏漏和谬误之处，期望能得到各位读者的指教。

甸甸有学术天赋，喜欢读书，勤于思考，无论是理论辨析还是文献考证，都有些心得，有很好的学术潜力。我作为她的导师，能教给她的其实很有限，反而是她很有活力的想法，经常能给我启发，这就是所谓教学相长了。目前，她正随晁福林教授做博士后工作，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晁先生是先秦史和先秦文化研究的大家，他精湛深厚的学养和绵密博通的治学方法，必能给甸甸更大的助益，使她在学术之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这是甸甸所期待的，也是我所期待的。

过常宝

## 前 言

如今的我们很难想象，人类向文明迈出的第一步，究竟需要何等壮绝的勇气。聚集起小小的社群，搭建起简陋的住处，在可怖的凶兽面前举起手中粗劣的武器，在无常的天气中撒下未经驯化的植物种实——这种近乎无畏的蛮荒之力，恰恰是揖别无知的能量之源。近世以来的学者相信，正是农业的诞生赐予了先民群聚而生的力量。不同于采集和狩猎这两种最初的生产活动，农业改变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根本方式，“人类由过去的那种简单、被动的自然资源的索取者，逐渐转化成为有头脑的、主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者、生产者”<sup>①</sup>。农业革命唤醒了先民作为生产者的自觉，人类对自然的积极认知，正是从这个原点开始的。他们冀望从自然界中找到某种真理性的启示、某种与人世相关联的规律。正是因为坚信着人事活动中蕴藏着某种自然合理性，人类才能拥有立身于天地之间的自信。即使今天看来，这份自信未免有盲目之处，但从中生发而来的，更有一份为万物表率的自律，并以不同形式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文明的肌理之中。

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生产力浪潮的农业革命，大约发生于1.1万年前。当时冰期结束，气候转暖，人口增加。“历史的事实的确表明：

---

<sup>①</sup> 李世安：《世界文明史》，第5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任何地方最有利于农业发展，在那里分工的社会组织也最先开始发展”<sup>①</sup>。建立城市、实行农耕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很快得到传播。中国的农耕实践稍晚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这多少要考虑到一些自然因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天然是大麦、小麦、燕麦、豌豆等粮食作物的起源地。据学者考证，符合人类种植栽培要求的农作物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地中海和中近东地区，亚洲东部只有六种，澳洲与美洲只有两种。<sup>②</sup>

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古代巴比伦和古代埃及在经营农业之余，发展出了两项重要技术：其一为灌溉，其二则为历法。古巴比伦人早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就已创建出最早的阴阳合历，并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已测定出精确到秒的太阳年长，还制定出以八年为周期的置闰历法。古埃及人的历法创建也颇能体现地域特色，他们将一年分为三个季节，以每年 6 月天狼星在黎明前出现于东方的那一天作为岁首，以下 7 月至 10 月为尼罗河泛滥时期，11 月至次年 2 月为播种时期，3 月至 6 月为收获时期。每个季节分为 4 个月，每月共 30 天，如此一年共有 12 个月，加上岁末 5 天节日，共有 365 天，至于置闰时间则随时由官方调配。后来罗马官方制定的儒略历即是由埃及历法发展而来，也是今天公历的雏形。

历法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观测月相和太阳运动等天文事象的周期，以此确定一个绝对长度的时间单位，从而指导人事活动。作为一项相对抽象的科学，历法与制陶、灌溉等实用技术并时而起，可见其深植于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但是，假若没有天象这样的坐标系存在，人类观念中的“时间”，无非与“颜色”的命名一样，是一种完全主观的判定。正如“季节”在埃及人眼中为三，殷人眼中为二，今人眼中为四一样，只要符合一时一地的农作物生产周期，作为制度的历法就可以成立。但是，这样的历法并不完美，在可观测的星象、物候之外，人们还希望能够通过推算来预测时间的周期。这份对时间精确性的渴求，可能是人类在文明史上对真理

① [荷]李伯庚：《欧洲文化史》，第 8 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② [日]田家康：《气候文明史》，第 56 页，台北：脸谱出版社，2012。

的第一次怦然心动。从宇宙运动的规律中，总结出最具普适性的真理，这样的图景具有一种宗教性的诱惑力，或许这也是古巴比伦与古埃及在历法之外，都早早发展出了占星术的内在动因。

占星术与天文学，晚至启蒙时代才正式决裂。与其说此前的 astrology 既表示天文学也表示占星学，不如说在当时它们的观念是等同的。在托勒密的时代，astrology 和 astronomy “这两个词只是观测天象时的不同运用，后者解释其本身的运行，我们现在称之为天文学，前者将天体运行与人世相联系，两者在当时是完全不矛盾的”<sup>①</sup>。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辉煌的天文学成就，与占星的需求密不可分，如两个文明绘制天子宫图都是出于生辰占星术的需要，也同样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方位来做出政治或生活方面的预测，并以此安排祭祀仪式。祭司们预知人事的能力，可能是由预测星辰方位的能力推演而来，因此观测天文的官员，在几个文明中多少都具有宗教性的背景。

总体来说，今天我们基于现代科学而提出的“天文学”，并不能准确还原上古时期的具体语境。在中国，“天文”一词取自《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sup>②</sup>。贲卦这则卦辞将天文与人文对举，强调其在概念与地位上的互文关系。到了《隋书·经籍志》，则谓“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明确为天文赋予了政治占星术的属性。因此，中国古代的“天文”一词，本质上更接近于 astrology 而非 astronomy。但今天我们已经习惯用“天文学”表示后者，用“占星术”表示前者，所以“天文”一词的科学属性，在当代已经自成语境。虽然希望能够尽量还原上古的语境，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无视今天的语境，而将“天文”划定为同时包含 astrology 和 astronomy 的概念。上古天文这项知识传统，旨在寻找某种规律，这种规律既是天体运行的自然法则，也足够为人世的政治和生活提供价值与伦理的支撑。对于这种包含了法则与观念二重含义的知识传统，本文沿用江晓原先生《天学真原》的提法，将其统称为“天学”。

<sup>①</sup> 张隆溪、葛兆光：《求异还是趋同：谈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思接千载》，第25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sup>②</sup> 阮元：《十三经注疏》，第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中国的天学知识传统，也是出于农作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与河姆渡文化遗址等早期聚落遗址中，已经出土大量石制、骨制农具与谷物化石，陶器上也常见稻穗形的装饰花纹。这意味着在七八千年至四五千年前，中国已经初步进入锄耕农业的阶段。锄耕农业属于一种定居或半定居的农作方式，而即使是非常短暂的筑城定居，也是从“文化”突进到“文明”的标志。考古学家在浙江良渚遗址发现了用来犁地、施肥的工具，还发现了灌溉用的沟渠和水井遗迹。这都表明，至少在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带已经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发展。种植业的发展，根植于对历法的掌握。冯时先生对西水坡墓葬蚌塑的研究，王树明先生对大汶口陶尊刻符的考察，以及陶寺圭表的发现，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早在新石器时代，最远至公元前6500年，先民就已经开始关注和测量几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如夏至日和岁首日。从天学的角度看，一方面这是星象观测的起步，另一方面则是节气制度的先声。

作为天学与人事最直接的联系体现，历法制度通过寻找星象与物象的周期规律，为人事活动寻找某种同样可供重复检验的准则。从先周的观象授时时代，再到战国以后的推步历法时代，中国上古历法经过了从直观到抽象、从粗疏到精确这一标准的科学发展历程。一个值得珍视的现象是，古埃及与古巴比伦的历法，其承载形式通常是农书或星图；但在中国，天学记录在形式上体现出整饬的格式感。以《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为代表的月令文体自不必说，就连渊源较早的《四方风》《夏小正》《尧典》等文献也有着强烈的形式感乃至文学色彩。究其原因，中国天学的主要传承者虽与古巴比伦、古埃及一样同为巫祝，但中国的巫祝同时也是史官这一群体的前身。殷代的大巫一般由政治领袖兼任，在周代他们被吸纳进了官僚体制之下，成为服务于王室的史官。他们天然地拥有保管文献、写定文献的职能，而天学知识正是他们文化背景中最重要的一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述出身“重黎之后”，“世序天地”<sup>①</sup>。在《左传》等历史文献中，我们也时常能看到史官以“时”“不时”评价君王政治得失的字

<sup>①</sup> 司马迁：《史记》，第24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句。可以说，天学是史官重要的知识背景与价值武器；而史官对天学的传承，也赋予了天学更多价值和观念上的内涵。

在四分历等推步历法得到推行的时代，传承自上古知识的天学话语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在民间广泛流传，在《诗经》《楚辞》等文献中仍可发现它智慧的闪光；另一方面，战国诸子出于不同的论说目的，并因为知识背景与个人气质的不同，他们对“天”与“时”分别做出了极其精彩的阐释，并最终由阴阳家构建起五行体系这一最具野心的宇宙图式。至于《山海图》《管子·幼官图》等表现上古时令知识的图画文献，在写定和流传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转录为文字，这或许是一种文字理性的体现，然而这部分图画文献在记录者的转录和误读中丢失了大量信息，也是今天我们解读古代天学知识的难点所在。

不过，借助现代的科学手段与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近年来学界对古代天学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成果，使之得以进入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在重建上古天文历法体系原貌方面，张汝舟、张闻玉两位先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张汝舟先生考证出四分历创制于战国初期，这就划分开了星象历时代与推算历时代，标志着“观象授时”作为制度实在的终结。这一发现，对我们研究上古天学观念的转型有着重大意义。常玉芝先生《殷商历法研究》与冯时先生《中国天文考古学》研究古文献资料与考古证据，运用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研究方法，勾勒出先商直到战国的上古天学发展轮廓，极大地弥补了这一领域文献缺失的不足。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上古天学与先秦思想史的关系。黄一农先生的《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以西汉到清代的几个天文史案例为中心，对古代天文与社会的交融互动做出了十分有价值的社会学探讨。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以及他与钮卫星先生合著的《天人之际——中国星占文化》，都致力于讨论古代天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敏锐地指出了上古天学具有“政治天文学”的特殊性质。本文所使用的“天学”概念，即是沿袭江先生的提法而来。一点遗憾在于，江先生在研究上古天学时，使用的主要是战国时期的材料，而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发展史中，思想观念曾产生过非常剧烈的变革。因此，过于强调先秦天学的整体特征，



就容易忽略先秦思想史的特殊性。章启群先生发现了这一问题，在近年出版的论著《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中，他指出在先秦天文学史上曾发生过一次重大的转折，那就是从天文学向占星学的演变。章先生的论断，把握住了先秦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具有思想史的宏阔视野。但是，出于对先秦时代制度建构的关注，笔者更愿意淡化占星学与天文学的学科界限，将“政治”的范围扩大到先秦的祭祀礼仪、民俗生活等更广泛的层面，由此将章先生所说的“上古原发形态的天文学”之功能，理解为另一种干预社会的手段，从而在广义上也从属于“政治天文学”的范畴。此外，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王爱和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著作专门论述了晚商以降“四方—中心”宇宙观到战国末年五行循环宇宙观的演变，及其对当时王权建构的影响，其结论与研究方法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在这一启发下，笔者重新审视了西周推朔历法与颁朔制度的关联，并就十二月序系统对明堂五行系统的新变产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愿以此就教于方家。

上古天学知识在战国时期的传承者与阐释者，主要是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这一点许多学者已有共识。《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阴阳家文献，如今已大多散佚，但即使是在这样文献不足的情况下，阴阳家的思想仍然流行甚广，传承甚远。阴阳家思想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单篇论文常有洞见，而专著却多流于简单的概念介绍与事实例证，这可能也是阴阳家传世文献不足之故。在相关研究专著中，日本学者井上聪的《先秦阴阳五行》利用了考古学、文献学和民俗学的多方面材料，对隐藏在阴阳五行思想背后的社会功能、知识源流、观念生成等做出了更深层次的研究，是一部较有价值的著作。

先秦文献的写定往往伴随着某种具体的社会职能与知识背景，这一点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有所体现，也是本文希望探索的议题。当代学者中，从知识角度考察先秦文献的，有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考》中对“实用知识”与“制度知识”的区分，还有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对“一般知识”和“精英知识”的区分。另外，对于先秦文献及其社会功能，也有诸

多学者立足于文化史做了相应研究。业师过常宝先生在《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和《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两部著作中，深入研究了先秦文献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写定过程及所依附的社会功能。之后又有叶修成博士的《〈尚书〉文体研究》、侯文华博士的《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刘全志博士的《战国知识形态与诸子文献的生成研究》等论文专著，为文献的文体学研究、文化功能研究提供了范式。总之，使用上古时代的知识观念、制度背景与文献功能对文献生成做出研究，已有不少先例。本书的选题既已确定了具体的知识门类，就不再对知识分类进行重复研究，而是试图顺着古代天学发展的脉络进行纵向的考察，研究这项知识的发展与功能的变化是如何影响着文献的写定与人们观念的变迁。

可以说，正是在诸位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今天我们才得以立足于考古证据，反过来观察文献中存在的矛盾和真实。这样一来，文献证据就不再是我们思考的前提或起点，而是能够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天学作为知识与观念的属性，也不再是板结的一块，而是得以在思想史的长河中流动起来。

然而，与变化多端的人类文明史相比，这片宇宙却显得如此安稳与恒定。正因有着这样廓大而绝对的坐标系，我们在简册间窥见先祖仰望星空的表情时，才能产生理解与共鸣。无论是传承还是裂变、解释抑或阐释，只要坚守着脚下的坐标，就可以相信，即使远隔千年，我们也注视着共同的风景。

## 目 录

第一章 观象授时：商代的天学与权力 .....	1
第一节 殷商的天学知识与时间观 .....	1
一、星象历法知识进步 .....	1
二、四气二季的观念生成 .....	6
第二节 “玄鸟生商”与“绝地天通” .....	12
一、凤鸟神话的授时遗迹 .....	13
二、知识垄断与权力起源 .....	19
第二章 立中序时：西周春秋的天学与制度 .....	29
第一节 以时序政的观念渊源 .....	29
一、“时”：知识与观念的一体两面 .....	29
二、“政”：时间秩序的政治合理性 .....	36
三、世序天地：史官的天学背景 .....	40
四、政以和时：理念与制度的交响 .....	51
第二节 西周官制的时序建构 .....	58
一、四时五方的宇宙观与中央王朝的建立 .....	58
二、《周礼》中的官制与时序 .....	79